

蘇聯外交政策的回顧和展望

——從外交史觀點剖析蘇聯政體崩潰後 的國際新局勢——

◎郭展義◎

壹、前言

蘇聯瓦解，這個主導國際政壇七十年的社會主義帝國聯邦，終於在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強烈要求下，各自獨立。一夕間，整個國際社會秩序全然改觀，東西對立的冷戰狀態已成歷史。然而，瓦解後的十五個共和國獨立國協，今後的國際外交政策如何？及對整個國際局勢的影響如何？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基於國際關係的「不變動性」，所以本文就歷史的觀點，以蘇聯外交政策變遷的傳統類型，來探討今後獨立國協外交政策發展的趨向，及整個國際新局勢的演變。

蘇聯的外交政策在共產革命以後，呈現了國際化的性質，是一個充滿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但是蘇聯外交政策，並沒有因此而流於忽略內部合作或適應的「原則主義」上。相反的，蘇聯在布爾雪維克政權初期，爲了重建內戰所造成摧毀的家園，和爲了確保新政權能得到國際間承認，蘇聯拋棄了「理念原則」，而追求「現實主義」，西方學者評論這一階段的蘇聯外交政策，是在「光榮的毀滅」和「羞辱的生存」當中，蘇聯痛苦的選擇後者，確保政權存續的現實，雪維克政權初期，爲了重建因內戰所造成摧毀的家園，和爲了確保政權能得到國際間承認，蘇聯拋棄了「理念原則」，而追求「現實主義」，西方學者評論這一階段的蘇聯外交政策，是在「光榮的毀滅」和「羞辱的生存」當中，蘇聯痛苦的選擇後在，確保政權存續的現，重於社會主義世界化的目標。以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爲最高實現目標的蘇聯政權，在這一個痛苦之經驗中，體會到生存重於理念的基本形態，七十年後的今天，蘇聯同樣步入這個淒涼的歷史途徑。

令人意外的，蘇聯外交政策七十年來歷經六個形態的變化後，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卻要求放棄「羞辱的生存」，而使蘇維埃聯邦「光榮的毀滅」，這個期間蘇聯的內政和外交充滿微妙而戲劇性的轉變。從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初期至一九三四年之間，列寧執政和史林掌權初期，蘇聯很艱苦的突破外交孤立，建立共產社會體制，直至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蘇聯利用兩次世界大戰的矛盾期間，一方面結合德國納粹勢力，擴張領土，另一方面轉而支持英美對抗德日，進行以國家主義至上的外交政策。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五年是東西大兩大集團的冷戰高潮，蘇聯共產勢力全力向外擴張，並結合華沙公約組織，對抗北大西洋軍事組織，形成美、蘇強烈的

對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蘇聯內部鬥爭已經開始強化，世界共產集團也產生嚴重分裂，蘇聯開始軟化外交迴避戰爭。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八四年期間，蘇聯利用美國人民反戰風潮，大舉增加軍備，以軍事武力大幅度趕上美國，形成超強軍權大國。但是卻也因獲得軍備競賽的優勝卻也導致經濟崩潰。直到一九八四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後提出「重建」(perestroika)大計劃，試圖使蘇維埃社會主義現代化、人性化、經濟化、民主化。然而，卻加速了蘇維埃聯邦崩潰的腳步。

貳、布爾雪維克政權成立期(1917~1934)

◎列寧執政和史達林掌權初期◎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個階段，正是蘇聯布爾雪維克政權成立後，在紛亂的內戰，一方面要執行革命的重建，另一方面要促成外國勢力的撤退，並且要突破國際孤立的劣勢，因此蘇聯在這個階段採取了下列三個外交政策：

- 一、排除外國軍隊干涉·建立共產社會體制。
- 二、國際主義世界革命·國家主義自圖利益。
- 三、突破外交上的孤立·促進國際經濟交流。

一、排除外國軍隊干涉·建立共產社會體制

蘇聯在革命後實施共產主義，並且由於內戰委員會(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並對蘇聯採取軍事干涉行動，致使蘇聯在紛亂內戰中，又要分心去對抗外國強大軍力，直到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在這一段期間內，蘇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就是設法促成外國勢力撤退，以便專心建設共產社會體制。

布爾雪維克政權於一九一七年發動革命成功之後，並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正式通過蘇聯憲法，俄國改稱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Russi z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opublic)形成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國家。

布爾雪維克政權在革命之初，高唱著「土地均分農民」的口號，一時很得民心。但是革命成功之後，其頒佈的土地法案，卻將所有的土地列為國家所有，農民僅有耕作權，而沒有買賣所有權，這一土地法案實施之後，令所有農民又失望又憤怒，於是農民群起拒絕政府的徵糧政策，加上工廠皆收為國營，而實施嚴格之工人管理政策，而引起激烈糾紛，在這一種情況下，蘇聯統治階層不得不採取若干的強烈措施，這也就是「戰鬥的共產主義」(Militant Communism)政策，這一項政策實施之後，人民與政府之間頓時有如水火不相容的形勢，原帝俄時期的老軍官，受到新成立蘇維埃制軍官的歧視，因而更趨複雜和矛盾。加上國際間反共勢力蓬勃發展，並結合了國內這種不滿情緒，匯成一股反共潮流，而引發革命後蘇聯國內最嚴重的內戰。此時英、美、法、日等外國勢力也就乘機介入。在這段期間原屬俄國領土的芬蘭及波蘭，先後宣佈脫離蘇聯自行獨立。獨立後的波蘭於一九二〇年向蘇聯進軍，而引

起蘇波戰爭，蘇聯戰敗被迫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簽訂「里加條約」(Treaty of Riga)，將白俄羅斯及烏克蘭之西半部割讓給波蘭。(註一)

事實上，以當時蘇聯的國力，雖然處於內外紛爭不停的情況下，但也不致使在蘇波戰爭中戰敗，而是受到列寧在本階段的外交政策，「排除外國軍隊干涉，建設共產主義體制」影響，不願對外戰爭消耗國力而妨礙對內的建設，以蘇聯共產一廂情願的觀點而言，芬蘭和波蘭儘管獨立，但是當共產主義成功之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目標達成時，芬蘭和波蘭豈不是又回到共產圈內，所以說蘇聯在這一個階段，仍是以妥協的外交來減輕外國的壓力，進而促進內部經濟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體系的建立。

二、國際主義世界革命·國家主義自圖利益

當內戰結束而外國軍隊全部退出之後，蘇聯依然是一片凋零破碎的殘局，加上兩次大旱災，人民呈現半饑餓狀態，一九二一年又發生了二次暴動，列寧在這種天怒人怨的情況下，不得不實施新經濟政策，而向農民妥協，例如允許農民子孫優先獲得父母土地耕種權，加租農耕地，僱用勞工，承購耕作器具等，偏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半社會主義制度，旨在提高勞動情緒而增加生產，以解決嚴重的饑荒。

基本上，新經濟政策是主張促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交流，以協助蘇聯內部產業復興計劃，但是，這個階段的國際社會，呈現著一片反對蘇聯社會潮流，在這一種國際社會的條件下，根本不利於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進行。因此，蘇聯不得不改變其外交戰略。

蘇聯共產主義外交策略，而兼顧以國家利益為主的「國家主義」，於是這個階段的蘇聯外交政策就在這兩者間徘徊，「國際主義」是為達成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目標，而「國家主義」為顧及本國利益，而促進社會、經濟之繁榮。事實上兩者也常會發生矛盾之處，而取捨之間更是困難，通常在外交事務涉及蘇聯共產的國家利益時，蘇聯往往放棄「國際主義」而選擇「國家主義」，雖然在國際宣傳上，蘇聯一再強調，無論任何情況下，共產國家的「國際主義」都是優先於「國家主義」。

列寧在外交政策上，同時選擇「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雙重標準，因為「國家主義」是為強化蘇聯本身的利益，以建設一個強盛的蘇聯。列寧認為唯有強盛的蘇聯，才能達成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之理想，換句話說，實行「國家主義」也就是為了完成「國際主義」理想，但是為了在執行上避免發生矛盾和衝突，列寧將涉及蘇聯本身的外交事務，交由政府外交部負責，而屬於蘇聯本身以外的國際革命事務，則交由共產黨組織執行，列寧則身兼政府和黨部的雙重領袖，以便同時調和兩種政策。

蘇聯在新經濟政策的執行下，使農業、工業、商業順利復興，同時也建立了健全的貨幣制度，發行新幣Chervonet，一時社會呈現短暫的復甦現象。於是蘇聯又開始耐不住寂寞了，一方面加強第三國際(Comintern)功能，一方面號召世界各國執行

「國際主義」政策，企圖將共產主義思想推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於是蘇聯外交政策，又開始趨向社會主義革命趨向，但是由於列寧病重，史達林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出任蘇共書記長，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列寧中風，從此蘇聯政局就開始陷入權力鬥爭暗流，整個外交路線趨向「國際主義」的強化政策，因而也就暫告中斷。但這項現象維持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寧逝世為止，權力鬥爭暗鬥中，轉變成強烈的爭權對抗階段。

史達林爲了在「爭權對抗」中，爭取最後的勝利，於是提出「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觀念，史達林認爲按照當時的國際局勢，世界革命絕不可能在短期間內成功，因此必需充實蘇聯本身實力，以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做爲支援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泉源。史達林這一項現實理念，很爲當時的蘇聯人民熱烈的支持，於是史達林又乘機實行「五年計劃」經濟改革，這一項經濟改革也就影響了蘇聯當時階段性的外交政策。

三、突破外交上的孤立·促進國際經濟交流

蘇聯在「五年計劃」經濟改革中，強調只要經過五年經濟改革，蘇聯的科技就能超越美國。因此，蘇聯在工業革新中必需引進西方科技，而在關係天然資源的過程，更需要西方的資金配合，而這兩項經濟措施都是需要和西方加強經濟交流，在這種強烈經濟需求下，重大改變了蘇聯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而表現出和西方國家相互共存的外交方式。

其實相互共存的外交理念，在列寧執政的後期中已有若干跡象，但是，那僅限於意識形態上的理念，而真正付之行動，應該是史達林從事「五年計劃」以後的階段。早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國際聯會」在義大利的Eenoa，舉行國際經濟會議時，蘇聯代表Chicherin即在會中表示：「蘇聯主張創造一個新社會主義體制，和資本主義國家相互共存的時代。」（註二）這一次蘇聯在國際上表明，願意和不同社會體制下的國家相互共存，並且要無條件承認各國，和認同各國工商集團的實務關係，這是蘇聯外交政策中，具有統戰性之彈性特色，史達林卻把它體化了。

「相互共存」之目的，雖然是在促進國際合作，但是蘇聯在這個階段而言，內政上考慮重於外交意義，因爲五年計劃若能成功，史達林就能順利執政，否則勢必要被整肅下台。在五年經濟計劃中，蘇聯爲了加強工業建設，而全力開發天然資源，例如興建馬格尼托爾斯克(Magnitogorsk)工業中心及烏拉(Jral)及庫資源捏滋克(Kuzneesk)組合性工業中心，聶伯河發電廠。這些建設都需要大量資金，而此時的蘇聯何以能有這麼龐大資金呢？唯一的途徑就是以貿易輸出賺取資金，但是爲了外銷就必需促進國際關係，爲了促進國際關係，就必需時放棄意識形態上之對立，而緩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工作之進行。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對外則實施親善的外交政策，以突破國際間的孤立，對內則強迫執行農業集體化運動(Agrcul,turial Clectivization)，以壓榨農民，大量外銷農業品到資本主義國家，以換取工業建設所必須要之龐大經

費。這個階段蘇聯以經濟爲主的外交政策。

就實際的效果而言，蘇聯和德國建交，就是突破外交孤立之轉捩點。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蘇聯和德國訂了「拉帕羅條約」(Treaty of Rapall)，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個條約之精神，違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國際政治體系下，產生的凡爾賽體制。蘇聯以拋棄對德國在第一次大戰的賠償權，換取德國對蘇聯的第一個承認國。

事實上，蘇聯願意以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來爭取德國在外交上之承認，實在其不得已苦衷和特殊之目的。原來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新成立蘇維埃政府，曾發表聲明不承認蘇聯過去舊政權之國際債務，也就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底以前，俄羅斯帝政期的國外借款，新政府一概不認帳。這一項違反國際公法的聲明，致使所有債權國家，包括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美國等相當不滿。加上蘇聯共黨於西社會的意識形態和第三國共產在各國的顛覆活動，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對共產主義，產生恐懼和排斥的心態。於是每當蘇聯向各國提出外交承認時，西方各國無不以清償欠債爲談到先決條件，致令蘇聯在外交陷於孤立。當時蘇聯爲了解決內部經濟危機，必需設法突破外交困境，以爭取外國科技和資金。

德國在拉帕羅條約承認蘇聯之後，英國也於一九二四年正式承認蘇聯，從此意大利、法國、挪威、奧國、希臘、瑞典、中國等都相繼跟進。但是美國依然不肯承認蘇聯，由於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國家，人民崇尚自由，對蘇聯專制政權，美國人民極爲反感，加上美國在經濟上根本不必仰賴蘇聯，所以一九二〇年以來，美國一直率領著美洲國家，拒絕承認蘇聯政權，這一項抵制行動，使蘇聯不能突破外交孤立困境。由於美國對蘇聯的若干敵視態度，也導致英國和蘇聯之關係無法作適當的發展，尤其一九二七年又因阿柯斯(Arcos)事件，導致了雙方斷交，直到一九二九年英國工黨執政，在意識形態下較傾向於社會主義，所以也由於工黨的執政，英蘇兩國又在一九二九年 月二日協議恢復邦交。

一九三二年發生世界經濟恐慌，美國生產貿易也都陷於低潮，美國貿易商人開始注意到蘇聯廣大市場，因此紛紛要求政府改善對蘇聯關係，加上日本勢力積極擴張，嚴重威脅到美國的權益與安全，致使美國總統羅斯產生了「蘇聯制日」的構想，終於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承認蘇聯共產政權。

在這個時期的布爾雪維克政權，由於內政上之需要，不得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共存狀態，所以呈現「共產理念」重於「經濟現實」的傾向，但是蘇聯並沒有因而脫離馬列主義的附屬性，在外交政策軌道的公式方面，係依照外務人民委員會(The Commissariat for Foreign Policy)公開研訂之原則，但是爲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目標，卻在私下秘密的對資本主義國，執行著共產主義顛覆行動。像這種布爾雪維克政權的現實主義，產生了蘇聯對外政策的雙重構造。(註三)

參、兩次世界大戰的中間期(1934~1945)

◎史達林執政中期◎

蘇聯在本階段的外交政策變化最大，當然，一方面則因為國際局勢惡化，而另一方面則是蘇聯爲了國家生存，而表現出缺乏堅定立場而造成的結果，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三九年被國際聯盟開除會籍，一九三五年爭取參與英美集團陣容，一九三九年卻投靠德國納粹，一九四一年爆發德蘇戰爭之後，又投入反納粹的英、美陣容。在內政和外交相互矛盾的蘇聯，一方面極力保持中立，而避免介入戰爭，但是卻又儘量對外擴張領土。要進行世界革命，又不得和西方妥協，要輸出共產主義理念，又不得不解散第三國際組織。爲了分析這個階段外交政策的變化，我們選擇下列三點重要說明：

一、採行集團安全外交·策動人民陣線政策。

二、結合德國納粹勢力·擴張領土保持中立。

三、聯合英美抵抗德軍·背棄條約對日宣戰。

一、採行集團安全外交·策動人民陣線政策

蘇聯和美國建交之後，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家，也相繼和蘇聯建交外交關係，尤其一九三四年獲准加入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從此蘇聯開始活躍在國際外交舞台上。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最擔心的就是在亞洲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另外，就是恐懼德國納粹(Nazis)侵略主義勢力日漸龐大，在這一種東西兩面強敵虎視威脅下，史達林很敏感的把握著日漸好轉的國際情勢，開始執行「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外交政策。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及五月十六日，分別和法國及捷克簽署同互助公約，希望藉著和平條約來促進集體安全保障，在這段期間前後，蘇聯也曾和伊朗、波蘭、芬蘭、外蒙古、西班牙等國家，訂立類似這一種的和平條約。蘇聯在恐懼外力入侵的情況下，展開「集體安全」策略，但是這種外交策略畢竟是屬於消極性、被動性。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法國舉行的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一項「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外交政策，主張各國共產黨必須加強和當地激進份子，及對政府沒有好感的反對份子，並和廣大的人民群；結合起來，將這些反對勢力結合成一個顛覆政府的聯合陣線，以達到共產黨普遍在世界各國執政之目的，也就是說，在沒有能力用武裝革命力量推翻政府，建立共產主義體制國家以前，先以統戰方式，聯合當地所有反對勢力，達成共產黨在資本主義社會政體中執政的初步目標。

蘇聯共黨的「人民陣線」政策，確實發揮了若干的效果，諸加一九三六年法國的勃魯姆內閣，和西班牙的社會黨內閣，都是標準的「人民陣線」執政階段的傑作，其他地區包括中共、菲律賓及越南等地的共產勢力，也都有著相當明顯的擴張。但是由於各地共產勢力的快速擴張，也同時引起了各國政府相當警惕，而開始進行圍

剿共產勢力，加上共產主義的轉運站法國「人民陣線」的革命輸出。事實上，法國因後力不繼，嚴重的影響到「人民陣線」的革命輸出。事實上，法國因納粹勢力侵略，才試圖去接近蘇聯共產主義，也因為接近共產主義，才認清共產主義的本質。一九三九年蘇聯提出「相互援助條約」簽署計劃，卻遭到法國和英國的拒絕，英法兩國知道，與其要結合蘇聯共產主義，不如採取柔懷納粹路線。

慕尼黑會議的舉行，就是英法對德國納粹柔懷政策的表現，在這個會議上，英國首相張伯倫，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法國首相達拉第，再加上希特勒等四人，共同簽署條約作成決定，同意要捷克把蘇台德區割讓給德國。此時蘇聯認為在協助西方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英、法拒絕蘇聯同盟，卻反而妥協於納粹，使蘇聯認為外交政策有重新調整的必要。

二、結合德國納粹勢力·擴張領土保持中立

蘇聯在「集體安全」和「人民陣線」兩項外交政策相繼失敗之後，同時也遭到英國和法國的背棄，致使蘇聯開始有爭取和德納粹的想法，在這個時候，希特勒正想暫時避免和蘇聯直接衝突，於是兩國便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Treaty of Nonaggression)，並且附加秘密附加協定(Secret additional Protocol)，劃分雙方勢力範圍。

德國和蘇聯訂了這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就立刻揮軍直入波蘭，而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德軍從西部進攻波蘭時，蘇聯也藉口保護自俄羅斯族及烏克蘭人，將軍隊開進波蘭的東部，而和德國瓜分了波蘭。

德國入侵波蘭之後，英國和法國立即對德國宣戰，雙方即陷於敵對的局面。另一方面蘇聯轉向芬蘭侵略，也引發了芬蘇戰爭。這一項侵略行動引起國際間交互指責，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國際聯盟通過一項開除蘇聯會議案，從此蘇聯又和英、法造成敵對局面。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芬蘭終於抵擋不住蘇軍強烈的攻勢，而向蘇聯求和，並且將芬蘭拉多加湖之西北岸及卡雷阿一帶土地全部割讓給蘇聯，蘇聯並獲得漢格半島為期二十年的租借權。蘇聯自蘇芬戰爭勝利後，又將勢力範圍擴充到波羅地海，同時併吞了立陶宛(Latvia)、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ithuania)等三小國，使蘇聯的海上交通暢通無阻。一九四〇年蘇聯又進兵羅馬尼亞，佔領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及在哥維納(Bukovina)的北部。如此蘇聯就能直接控制了卡帕契昂(Carpathian Passes)，並使蘇聯勢力範圍擴張到多瑙河流域(Danubian basin)。

蘇聯對領土擴張政策是有其傳統性的，史達林認為控制東歐，才能確實維護蘇聯的安全，史達林擔心西方國家透過東歐作為攻擊蘇聯之捷徑，因此蘇聯在這段期間的策，就是集中全力控制東歐，因此蘇聯除了擴張領土外，並不希望介入任何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成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帝國戰爭，並且訂下了在戰爭中持中立的政策，以求不要捲入大戰而危害蘇聯的國家利益，一方面也在戰亂中尋求領土的擴張機會，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和日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確保亞洲方面的安全。在這一段時期蘇聯的對外政策，則是在大戰中保持中立，祇要蘇聯能保持國家安全，這個中立政策就繼續持下去。但是蘇聯這一項中立政策卻由於德軍的入侵而遭破壞。

三、聯合英美抵抗德軍·背棄條約對日宣戰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蘇聯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一年九個月之後，希特勒斷然違背互不侵犯條約，大舉進攻蘇聯，而逼使蘇聯再度投靠美國和英國的反納粹陣容，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在戰前強烈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都反而紛紛和蘇聯併肩作戰。德軍入侵蘇聯不到一個月，英國就在莫斯科和蘇聯簽訂一項軍事協訂，同時美國也向蘇聯表達經濟援助蘇聯的意願。

由於國際局勢的影響，硬把蘇聯、英國和美國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結合在同一個戰線上，但是彼此間還是各懷鬼胎。英國和美國的立場當然希望蘇聯加入西方自由陣容，共同抵抗納粹的侵略，而蘇聯則只站在現實的利益上作考慮，尤其是戰後領土擴張或利益分配的問題。一九四一年九月英、美兩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當時史達林就明白的告訴英國團長Bever brook在「戰爭目標」(War Aims)和「戰後組織計劃」(Plans for Postwar organization)上尚未達成明確協調，彼此間根本無法做到坦誠互信的軍事聯盟，也就是說，彼此利益沒有分配清楚以前，其軍事合作將沒有任何意義。由此可見蘇聯在領土擴張政策的用心，同時也可以證明蘇聯在戰後土擴張政策，所以順利進行，至少在戰時和英、美兩方集團，保持某種程度以上的默契。

蘇聯爲了避免和歐洲及亞洲之兩強同時作戰，因此，除了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外，更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協訂」，這個協訂使蘇聯遭到德國攻擊之後，可以全力應付，而使德國不得結合日本包挾蘇聯。但是蘇聯在德軍戰敗之後，卻配合聯軍對進攻擊，其主要原因是圖蘇聯本身國家利益，以實現蘇聯在雅爾達會議所提條件之實現，包括讓外蒙古保持現狀，以作爲中蘇邊界的緩衝地帶，並奪取和日本糾紛中的千島群島、庫頁島，另外租借中國大連、旅順作爲軍事基地，中蘇合營中東和南滿鐵路寺實質利益。

肆、東西兩大集團冷戰期(1945~1955)

◎史達林執政後期及赫魯雪夫掘起前鬥爭期◎

蘇聯的國力，在這個階段獲得相當快速成長，蘇聯共產勢力在國際間的擴張行動，也在這個階段有著相當明顯的發展，同時由於蘇聯共產勢力快速的伸張，致使

美國決定執行圍堵政策，於是演成了冷戰的對抗集團勢力。本來雙方集團都在經濟合作和戰後重建的前題下結合，但是由於密切的經濟合作，和恐懼共產勢力的威脅，由經濟合作而成軍事聯盟，而逐漸步入軍備競賽，在這一個階段性的武力競爭下，蘇聯成功的發展原子彈和氫彈，使共產主義世界革命的意識形態，演變成軍事科技的具體經驗，從蘇聯傳統外交領導軍事的過程，轉變為軍事領導外交的開始，本階段特別選定下列三角度來做階段性的分析：

- 一、共產勢力向外擴張，形成對抗西方陣容。
- 二、擴張過程遭到圍堵，美蘇衝突逐漸形成。
- 三、結合華沙公約集團，對抗北約軍事組織。

一、共產勢力向外擴張，形成對抗西方陣容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蘇聯領土擴張有實質的助益，比起領土的擴張，蘇聯在勢力擴張，更有其特別意義，尤其是對東歐附庸國家的掌握，是蘇聯在外交上的一天豐收，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短短四年之間，蘇聯建立了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東德等八個共產政權，並且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英德維亞等四國，併入蘇維埃聯邦之內，而構成一個足以和西方民主國家對抗的共產集團。蘇聯為了加強對外勢力的擴張行動，蘇聯在這段東西兩大集團的冷戰期間，更努力促進共產圈的團結，並廣結善緣，從一九四五年開始到一九五〇年為止的六年之間，和十三個國家或政權，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其中包括：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和匈牙利復交，十一月十日和阿爾巴尼亞建交。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和阿根廷，十二月三十一日和泰國等建交。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和印度建交，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緬甸，五月一日和巴基斯坦，十月十二日和北韓等建交，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和東德建交，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印尼，一月三十日和北越等建交。

另外，蘇聯並廣泛的和其他國家締結友好條約，以加強國際間的經濟、貿易、文化等各方面合作事宜，從一九四六年開始一九五〇年止，五年間即和外蒙、羅馬尼亞、匈牙利、芬蘭、波蘭、保加利亞、捷克、阿爾巴亞、東德、中共等九個政權，締結友好合作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美、英、法、蘇等五個聯合國任理事國，全力為恢復戰後的世界經濟復興而努力，並主張加強國際間的互助合作。

但是蘇聯卻不甘寂寞，蘇聯想單獨和東歐國家建立同盟勢力，用以包圍並孤立德國，這個作法在初期是可以得到西方國家的同情，畢竟蘇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到德國的防衛措施。蘇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利用西方國家的這種同情的心態，積極的展開其擴張政策，包括領土的對外擴張，以及共產勢力範圍的向外伸展。

二、擴張過程遭到圍堵·美蘇衝突逐漸形成

當蘇聯擴張勢力，伸展到土耳其和希臘時，西方國家就看穿了蘇聯共產的擴張政策。一九四五年六月蘇聯對土耳其加壓力，並要求讓土耳其邊界的土地，給蘇聯作為緩衝地帶，並且共同管理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s)另一方面，希臘內部也受到蘇聯所支之共黨游隊，大規模的攻擊，整個國家面臨崩潰之危險，在這個時候，希臘土耳其都希望英國派兵援助，但是英國自身力不從心，因此英國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透過英國駐美國大使館，通知美國國務院，說明英國沒有能力提供希臘和土耳其最基本的二億五千萬美元經濟和軍事援助，於是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國會提出報告，並求國會授權國務院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四億美元，杜魯門總統這一項「援助希臘和土耳其案受到當時兩黨議員熱烈讚成，從此美國開始對歐洲事採取積極的態度，而蘇聯在歐洲之擴張行動，從此開始受到美國的干涉，杜魯門總統這一項對國會的呼籲。即被稱「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希臘和土耳其也因為「杜魯門主義」的執行，而避免受到蘇聯的侵略。(註四)

蘇聯由於美國介入歐洲事務以後，顯得處處受到阻力，尤其美國實施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之後，美、蘇之間衝突就更加表面化。

美國戰後對歐洲的經濟援助政策，也就是「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 Plan)，把歐洲區分東歐和西歐，西歐在西方的支持下，設主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並且辦北大西洋公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來結合經濟、軍事的同盟。依據聯合國決議佔領的德國和韓，也分成東、西德和南、北韓。從此以美、英、法為中心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中心的東歐勢力，就開始展開冷戰的序幕。

西方「圍堵政策」和蘇聯「擴張政策」的冷戰狀態，一直維繫到後，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才告一個段落，而開始有了緩和的現象。爾後，國際局勢之緊張或緩和，幾乎都掌握在蘇聯的手中，必竟蘇聯的「擴張政策」是主動的，而美國的「圍堵政策」則是被動的。諸如韓戰中對北韓不利時，蘇聯又提議歐洲成立集團安全保障體系。

史達林去世之後，蘇聯形成集團領導局面，馬林可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赫魯雪夫則擔任蘇聯兵黨第一副書記，外交政策便趨向緩和狀態，一九五三年馬林可夫即在蘇維埃會議上表明：「所有國際問題都能夠用談判來解決，而國際關係經過長期的緊張之後，已經開始趨向緩和的地步」，一九五五年蘇聯和德國建立外交關係，公開承認國際體系的現狀，東西冷戰局面就逐漸的消除。(註五)

三、結合華沙公約集團·對抗北約軍事組織

戰後西歐各國在「馬歇爾計劃」援助下，經濟和政治便趨向穩定的局面。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英國、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等五個國家，在比利時首

都布魯塞爾(Brussels)締結經濟軍事同盟，並且簽訂布魯塞爾條約(Brussels Treaty)，使西歐的經濟合作，順利的發展到軍事聯盟階段，有效的赫阻共產勢力之威脅。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美國參議院通過范登堡決議(The Vandenberg Resolution)，主張美國得在憲法程序下，基於有效的互助防衛理由，聯合其他地區並參加集團聯盟，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國和義大利、丹麥、挪威、加拿大、葡萄牙、冰島也參加了這個，另外，也在華盛頓共同簽訂北大西洋公約，規定任何簽約國在歐洲或北美遭到攻擊，即視為對全體締約國的攻擊，十二個締約國將團結一致，共謀恢復並維持北大西洋地區的和乎與安全。第二年各締約國又同意，建立聯合武裝力量，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Ocean Organization)並以艾森豪將軍為最高統帥，其後希臘、土耳其、西德也相繼加入，使十二個加盟國擴大為十五個國家，形成一個堅強的反共聯合戰線。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後，蘇聯不斷提出強烈抗議，但是蘇聯在當時並沒有立即成立另一個軍事組織，以對抗北約組織的構想，畢竟蘇聯知道，以東歐共產圈為基礎之國際共產勢力，終究無法對抗北約組織的軍事聯盟。直到蘇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原子彈試爆成功，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氫彈爆成功之後，顯示蘇聯軍事武力足以抗衡美國。君上一九五〇年和中共締結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北越政權成立，證明蘇聯共產力量，從歐洲擴張到亞洲的時候，蘇聯終於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四日，下定決心在波蘭首都華沙，和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阿爾巴尼亞、東德、保加利亞等七個附庸國家，簽署華沙公約組織，成立一個對抗北約組織軍事同盟。

伍、和平共存政策的融解期(1955~1964)

◎赫魯雪夫執政期◎

一九五四年，也就是史達林死後的第二年，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Liyb Ehrenburg)，寫了一本小說書名「融解」(The Thaw)，以寫實的方式描寫史林時代，所發生的各種悲慘事件，一如塞風冰雪淒涼的景象，一九五六年連續出版第二集，描寫獨裁者死後，蘇聯社會自由的潮流，如冰雪化春暖花開的一片復甦現象。愛倫堡這部小說，正是描寫史達林死後，帶來蘇聯內部政治和社會自由化之景象，因此西方學者將蘇聯自史達林死後，蘇聯對西方政策的轉變，稱之為「融解時代」(The time of the thaw)，也就是冷戰趨向緩和的意思。

在這一個「融解時代」中，蘇聯對西方政策，從對立的意識形態，趨向於緩和的過程中最主要之特色就是表現和平共存政策。

在這個階段的前期，蘇聯是也因為配合國內經濟發展的因素，而不得不採和平共存之外交政策，和平共存政策到了赫魯雪夫執政階段，更是變成和西方資本主義

的妥協政策，因而遭致中共政權杯葛，形成國際共產主義嚴重的分裂，這種情況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蘇聯也發動了兩次不同於這個階段性的軍事危機，但是終究屈服在美國強大軍事力量之下。本階段從下列三個階段性觀點分析：

一、因內爭行強硬外交·經濟需求和和平共存。

二、共產集團嚴重分裂，革命領導權遭杯葛。

三、試探性的軍事危機·羞辱般的迴避戰爭。

一、因內爭行強硬外交·經濟需求和和平共存

蘇聯的政局自從史達林死後，形成了集體領導的新局面，但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依然維持蕭規曹隨的原則，集體領導階段之外交政策決定，莫洛托夫和馬林可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這兩人也曾一再表示，在外交政策上，可以透過協議的方式而達成和平的原則，而實際在外交的運作上，卻又怕表現軟弱而遭受國內政敵之攻擊，以致於影響在國內奪權鬥爭、諸如一九五四年美、英、法、蘇外長會議，馬林可夫和莫洛托夫在會場上要求美國勢力退出歐洲，及西方國家在外交上承認中共、北韓、北越、外蒙古等共產附庸國，並解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其強烈的態度和意見，令西方代表大吃一驚，蘇聯這種對西方強烈的外交態度，一直維繫到赫魯雪夫政權穩定之後，才開始有了緩和的轉變，而在這個轉變以前，例如華沙公約的組成，仍然是史達林死後的一年十個月，這說明史達林死後，蘇聯集體統治政權並沒有立即改變強硬的外交路線，以採取西方比較緩的政策。相反的，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蘇聯在外交上，依然持和西方強烈之對立，這種現象一直維持到一九五七年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支等激烈派份子，被赫魯雪夫整肅以後，蘇聯的外交政策，才真正的步上和平共有階段，而在這個階段以前的馬林可夫掌權時期，僅在內政上是尋求妥善的改善。

一九五三年八月八日馬林可夫，宣佈日後蘇聯經濟建設重點，將注意在民生消耗品上，使蘇聯輕工業政策，取代了傳統重工業策。但是蘇聯沒有優良的貿易制度來做輕工業外銷的輔助，相反的，因偏向輕工業的發展，卻導致嚴重的削弱重工業之進展，使蘇聯陷嚴重的經濟危機，於是在強烈的外交政策下，並沒有強有力的濟實力做後盾，於是蘇聯促成韓戰提早在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戰，以專心尋求內部經濟改革，這種轉變仍是由於馬林可夫企圖在國內經濟方面，創下奇蹟的因素，以作為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本錢，但是最還是失敗。（註六）

從軍事的觀點而言，自從美、蘇兩國擁有原子彈以來「恐怖平衡」促成了雙方要放棄毀滅性戰爭，畢竟美、蘇雙方領導階層，都不能率先發動核子戰爭，而造成同歸於盡的慘劇，於是雙方祇好尋求除了戰爭以外的競爭方式，於是蘇聯方面逐漸產生和平共存的理念，真正把避免和資本主義國家戰爭的主張理念化，對內實經濟計劃，對外實行暗中顛覆活動。

蘇聯受內政「經濟改革」，和國際「恐怖平衡」影響，將過去強硬的外交手段，轉變成為較具彈性的外交方式，並不表示蘇聯要放棄馬列主義原則，和西方資本主義永久相處下去，而是主張以緩和的方法，取代強硬的手段，進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策略，這種外交戰略在和乎共存時期，就埋下日後發展軍備競賽的伏筆。

二、共產集團嚴重分裂·革命領導權遭杯葛

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在階段性的意義，是可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避免核子戰禍的發生，並且可以消除東歐的敵意，以挽救共黨的分裂，但是和平共存政策是挽回了東歐集團卻造成了和中共破裂的結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屆蘇聯共黨全黨大會正式召開，會議主要係針對史達林死後的國際情勢，而提出應對方法，並且加強社會之影響力，及在和平共處的環境下，和資本主義作長期的對抗，以期以和平過渡的手段，實行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目標。在大會中赫魯雪夫宣佈對西方的和平共存政策，並且修正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原義，其中主要的命題是「雖然帝國依然存在，但是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此時毛澤東強烈批評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而提出「革命戰爭不可避免論」，從此中蘇共之間的理念紛爭就日趨嚴重。

蘇聯在一九五六年第二十屆蘇共大會後，就開始呼籲各國進行裁軍，要求停止發展核子武器，並且主動的縮減軍力，向西方表示友好。這種一反過去世界革命的意誠形態，更使中共無法認同，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共實施「大躍進經濟計劃」，蘇聯沒有給予援助，更造成了中蘇共的分裂，一九五九年六月蘇聯撕毀一九五七年和中共訂立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一九六〇年八月蘇聯撤回在中國大陸工作的技術人員，致使施工中的軍事工程停頓，並且鼓動印度對抗中共。蘇聯在這一串壓制中共的對抗手段中，致使中蘇共在理念上的分歧，演變成實際的衝突。（註七）

中蘇共衝突和美蘇關係之改善是有相關性的，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蘇聯柯期洛夫(Kozlov F.R)訪美國，同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莫斯科，相隔個月後赫魯雪夫親自美訪美，並且在大衛營和艾森豪總統舉行會談，赫魯雪夫返國回程中，順道訪問北平向毛澤東提出說明，但是卻遭到毛澤東強烈的指責，於是中蘇共的衝突轉變為更激烈。

三、試深性的軍事危機·羞辱般的迴避戰爭

在美蘇改善外交關係的過程中，除了遭到中共的杯葛之外，蘇聯擊落美國u2偵察機事件，也是致使美蘇關係再度惡化的主要因素，蘇聯在這一個事件發生後，即宣佈取消邀請美國艾森豪總統原訂元月訪問蘇聯計劃，並且拒絕出席巴黎高峰會議。

另一方面，古巴發生政變，卡斯楚(Fidel Castro)推翻了巴狄斯達政權，以反美為號召，這種斯楚主義(Castroism)，附合蘇聯支持民族解放對抗殖民主義的政策，於是古巴就形成了蘇聯支持的對象。由於古巴結合蘇聯友美，所以美國遂於一九六一年斷然宣佈與古巴中止外交關係，於是古巴和美國就更顯得水火不容。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在國際情勢變化之下，蘇聯也考慮試圖在和平共存階段中，採取比較強烈的外交手段來試探美國的外交態度，於是蘇聯就發動了兩次試探性的軍事危機。一次就是一九五八年「柏林危機」，一次就是一九六一年「古巴危機」，蘇聯採取這種軍事危機的策略，而卻不執意執行正的作戰，因此在兩次的軍事危機之後，隨即強調和平共存的重要性。這一方面從蘇聯在古巴危機後，先後和美國簽置「熱線協定」(Hot Line Accord)和「局部核子禁試條約」(Partial Nuclear Test Ban)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綜觀這一個階段的蘇聯外交政策，旨在以和平共存政策，爭取充分準備時間，以立軍事科技上的優勢，在軍事上沒有絕對優勢以前，蘇聯寧可選差尋迴避和美國戰爭不願意魯莽的欠發軍事衝突而自取滅己。另一方面，赫魯雪夫也希望消除東歐共產團的分裂。因為美蘇的化政治局面，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戰後都受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挑戰，尤其在共產主義世界造成意識態之分裂，產生多元性共產主義(Polycentric Communism)因上赫魯雪夫積極想統合共產國家，以維持蘇聯在共產世界的領導地位。

在軍事戰略方面，蘇聯想達到粉碎地約組織之目的，蘇聯認為北約組織的建立，是在對付社會主義類型國家，北約存在自然是對蘇聯的威脅，在蘇聯軍事力量無法摧毀北約的情況下，蘇聯以和平共存的政策，製造一個和平氣氛的假象。以這個觀點而言，蘇聯似乎以和平來瓦解西方士氣，以共存來分化西方集團，所以和平共存是具有積極性的意義。

陸、緩和國際緊張的低盪期(1964~1984)

◎布里茲內夫執政及安德洛波夫、柯金、契爾年柯等過度期◎

蘇聯之所以能躍居為首居一指的軍事強國，本階段是一個關鍵性之轉變，美國越戰失利後，相對的，蘇聯在中南半島佔盡優勢，逼使美國整個全球戰略不得不重新調整。為了保持軍事上的均勢，美國轉而勾結中，共造成中蘇共在衝突談判中，又發生了一項變因。本階段分成下列三個部份夾說明。

一、從和平共存到低盪·中蘇共衝突難消除。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赫魯雪夫去職，取而代之的是布里茲涅夫，大體上言布里茲涅夫上台的初期，其外交政策上仍然是延續者和平共存的政策，而且特別強調國際「緊張的緩和」(Razryadka Napyazhennosti)，也就是所謂的低盪(Detente)政策。

英國羅德·布瑞末羅(Lord Brimelow)曾說明低盪就是當國際局勢轉變過程中，情勢改變成對共產主義有利時，低盪乃是代表著政府間緊張關係的緩和。也就是低

盪本身就是一種戰術(Tac tics)，要達到和平共存戰略 (Strategy)目的以前的一種手段。(註八)

爲了促使國際共產之向心力，以及維持某種程度以上的紀律，在這個階段中蘇聯不惜動之武力，例如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以軍事武力推翻杜布克(A Dubeek)政府，而建立親蘇共黨政權，這一種對衛星國的「有限主權論」，使蘇共加強了東歐的控制，但是也造成西歐國家對共產更爲恐懼。(註九)

另外布里茲涅夫在歐洲以外地區，也擴大其所謂的民族解放革命運動，諸加在東南亞支援越戰，在東北亞支持北韓，在中東煽動阿伯國家，這顯示蘇聯在和平共存中，仍然不忌執行其擴張政策，這是蘇聯一方面對資本主義國家強調在意識形態方面絕不能妥協。

毛澤東自認爲是列寧的信徒，基本上，反對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而演變成理念和實際的衝突，布里茲涅夫上台之後，中共和蘇聯之間的衝突，就沒有赫魯雪夫時代那麼嚴重。但是這種意識形態之對立，並非換了領導人就改變的，尤其蘇聯已真正邁進了國際社會，豈能如同中共一樣的一味仇視西方國家，蘇聯僅能以軟硬兼施的方式，牽制西方國家，用以壯大共產勢力，諸加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蘇聯聲明開始核子試爆，以對付美國的核子武器試驗，逼使美國和英國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簽署「禁止在火氣層、太空、水底試爆核子武器條約」，這就是蘇聯外交上的一個手段，但是對中共而言，中共則認爲蘇聯和美、英企圖壟斷核子武器，因爲當一九六四年十日中共核爆成功之後，一九六五年向聯合國提出不擴散核子武器草案，而令中共非常的不滿。由於基本意識形態的差異，常會因觀點不同而產生衝突，這種現象似乎無法避免的，在本階段後期，美國就利用中蘇共之間的矛盾，而創造一個新的國際局勢。

二、美國外交矛盾之際·蘇聯軍力迎頭趕上

蘇聯在這一段期間，正逢美國反戰及姑息氣氛最濃厚的時刻，在古巴危機表現得強悍的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被刺身亡後，繼任總統林頓·詹森(Lyndon B Johnson)繼續執行甘迺迪的強硬政策，而且被捲入越戰，而查理·尼克森(Richard M Nixon)執政初期又見繼續擴大中，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森就職總統之前，美國越南的軍隊即有五十萬人，會計年度越戰經費是三佰億美金，並且將近三萬一千名軍士陣亡。美國在越南的失利，造成全國上下反戰熱潮，一九七〇年尼克森主義(The Nixon Doctrine)宣言問世，主張美國今後不再干涉他國的內戰，及地區性戰爭，美國僅提供武器及情報支持友好國家。顯然一九七〇年之後，美國受到反戰輿論壓力，在外交政策上已有趨向緩和的傾向，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宣布訪問中國大陸，一九七三年美軍全部撤出越南，另外，美國從反越戰而對共黨和解傾向，繼續到吉米·卡特(James E Carter)的人權外交政策，美國並且加強對中共關係正常化，以分化共產陣容，企圖以外交談判的方式，和共產主義和平共處，以避免軍競賽日趨嚴

重。然而在這一時期內，蘇聯利用美國這種矛盾的外交政策，加強軍備，提高傳統的作戰能力，使蘇聯的軍力在短短十年之間，達到和美國相同的水準，而成爲兩軍對立強權，這也是布里茲涅夫執政期間的最大特色。

根據外電報導，美國武器管制暨裁軍總署提出年度報告指出：「蘇聯售予開發中國家，在一九七七年武器總額爲九十五億美元，而美國六十六億，一九七九年世界軍費總數爲五千七百億美元，武器交易額爲二四〇億，而蘇聯獨佔九十六億，美國佔五十六億，一九八〇年武器交易總額爲三八〇億，蘇聯獨佔一四八億，美國六十六億。另外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之間，蘇聯武器輸出金額計高達三三五億美元，而其中二七七億是出售給開發中國家」。

蘇聯不僅擴大武器輸出，把軍火買賣當成最佳的貿易項目，而且蘇聯並增加國防預算，力求在軍備上超越美國就一九七九年爲例，蘇聯軍費預算佔國家總預算比例爲百分之五十一，佔全世界第一名，而美國僅百分之二十四點七，佔全世界第十名。

三、蘇聯政壇頻頻換主·美國強硬外交挑戰

在布里茲涅夫執政後期，因臥病而無力活躍於國際事務，而安德洛波夫執政時業已老邁體弱。於是於一九八〇年登上美國總統的隆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就顯得活力十足，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雷根在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實力(Serenglh)公平(Faieness)及平衡(Balance)的政策。

實施大規模的建軍計劃，以挽回卡特執政時期落後的軍備劣勢，另一方面也和進行蘇聯限武談判，以緩和蘇聯在軍事上的擴張。

契爾年科上台之後，外交事務在外長葛羅米柯的協助下，顯得比安德洛波夫時期更爲絡熱，對美的外交政策採取消極對立的方式，諸如一九八四年五月八日宣佈抵制洛杉磯奧運，並且繼續片面宣佈退出和美國的限制「中程核武」及「削減戰略武器」兩項談判，旨在尋求以更強烈的姿態，對抗美國總統雷根的強硬外交手段，另一方面蘇聯更加强和東歐盟國之間關係，尤其對於向心力不強的沙華公約成員國，執行其鞏固社會主義國家陣容的強硬政策。

事實上，美國在這一階段中，以結合中共而分化中蘇共之間的關係，並且利用中共對東南亞的影響力，使美國勢力得以重新介入東南亞。基本上，美國這個政策也是限制著蘇聯的擴張，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和蘇聯友好同盟條約」廢止，雙方在邊界上緊張情況，加上阿富汗和越南等事件，嚴重影響到中蘇共之間的正常關係。但是另一方面，蘇聯和美國及中共間衝突的情勢。(註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布里茲涅夫死後，安德洛波夫在短短七個月的權利鬥爭中，順利的登上黨、政、軍的要職，而獨攬大權於一身，由於安德洛波夫能夠控制國內的情勢，所以在外交的表現上，就具有較大之彈性，尤其在這個階段上，蘇聯的軍事力量，似乎已經追上了美國，因此在安全上沒有像過去那麼顧慮。安德洛波

夫曾於一九五四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期間，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由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革命，而蘇聯出兵收平，當時安德洛彼夫表現效忠，所以獲得黨中央的大力提攜，而平步青雲擠進蘇聯領導核心，所以安德洛彼夫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老蘇共」，其施政方針當可想而知。（註十一）

柒、蘇聯政體的重建與瓦解期(1984~1991)

◎戈巴契夫執政期◎

戈巴契夫執政之後試圖改革蘇聯，並提出「重建」(perestroika)計劃，決心淨化社會主義制度，促使蘇維埃更其現代化、人性化、理想化，以打破政府與人民間的隔閡，抒解人民普遍不滿的情緒。但是層層困擾戈巴契夫的內政問題，使蘇聯不得不在外交途徑上向西方低頭，同時也從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退居到幕後。茲就三個內政問題分析蘇聯政體的瓦解及其國際政治所扮演的角色；

- 一、民生需求經濟因素·長期困擾蘇聯當局
- 二、領土糾紛種族問題·相互糾葛暴發衝突
- 三、民族主義如火如荼·民主改革要求不斷

一、民生需求經濟因素·長期困擾蘇聯當局

長期困擾蘇聯的經濟問題，並沒有隨著戈巴契夫的和乎改革消逝，相反的卻因東西人民和資訊廣泛交流的頻繁過程中，致使蘇聯人民深深體驗到物質文明的重大需求，於是原本恰似一條冰封江河的蘇聯政情驟然解凍，隨之風起雲湧的改革事件，諸如蘇聯人民第一次舉行的公民投票、西伯利亞及烏克蘭煤礦工集體罷工、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運動成功、群眾反抗軍事改變並使之流產等等，卻相對的困擾著蘇聯執政當局。

的確，在經濟政策方面戈巴契夫執政後也發生若干的困難，因為蘇聯一方面要承接傳統龐大的國防預算包袱，另一方面又要解決當前蘇聯經濟危機，在執行維持對美國軍備的優勢，或減少國家預算支出政策中尋求兩全的方法，而上述「多元化外交政策」，就是蘇聯對美國提出裁軍和縮減軍備，尋求經濟改革措施，加強開發西伯利亞天然資源等一連串措施之外的一條外交新途徑。而這一項外交新途徑的重點，就是針對排除美國在亞洲擁有軍事基地及政治影響力的一種外交手段，表面上是限制並防止亞洲地區核子武器之研究發展和推廣，並且禁止亞洲國家部署核子武器、成立和平區，不要發展軍事聯盟等構想，其實主要目的就是要排除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及政治影響力。這完全和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的「歐洲安全會議」形式相同，蘇聯以歐洲外交成就的模式拿到亞洲來，這就是蘇聯這種從「多元化外交政策」所演變出來的新亞洲政策的執行經過和各國反應。

雖然戈巴契夫試圖運用外交手段來突破內政難關，但是蘇聯改革政策的執行卻缺乏效率，長久以來重軍事輕民生的經濟窘況如陷泥沼，物價和通貨膨脹的壓力迫使戈巴契夫放棄共產一黨專政，甚至於不得不解散共黨重組新聯合政府，致使蘇聯整體社會的改革氣氛蓄勢待發。一九九〇年五月葉爾欽當選俄羅斯共和國國會主席之後，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就開始處於「攜手合作」和「相互矛盾」的關係上，從一九八七年秋天兩人的決裂，到一九九〇年兩人成為政治盟友都是大勢所趨，為的是企圖整合保守派人士、軍方當權派及KGB等勢力，然而葉爾欽和戈巴契夫兩人間也常因「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的立場和觀念鬧得水火不容，最後也因經濟改革計劃導致兩方決裂，接著也使整個蘇聯政體全面瓦解。（註十二）

二、領土糾紛種族問題·相互糾葛暴發衝突

蘇聯種族問題非常複雜，包括斯拉夫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土耳其族（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阿塞拜爾人、土庫曼人、吉爾吉斯人、韃靼人、巴什基里人、哈克斯人、楚瓦什人、雅庫蒂人、卡拉卡爾巴克人）、拉脫維亞族、立陶宛族、烏格列族（愛沙尼亞人、卡累利亞人、柯米人、馬里人）、高加索族（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切禪人）、蒙古族（加爾梅克人、布里亞特人）、伊朗族（塔吉克人、奧謝蒂人）等等，其他地方官定的方言有一百十二種，可以說是極端矛盾和複雜、長期以來蘇聯在其民族政策上，都是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治形式上，倡導「民族平等」和「同化政策」上，尋求多元化民族主義政策，以求暫時壓制或化解種族問題。（註十三）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間的民族仇恨及領土糾紛是長期困擾蘇聯的難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亞美尼亞發生大地震，戰爭被摧毀殆盡形成廢墟，造成三十萬人流離失所，接著亞塞拜然人又血腥屠殺亞美尼亞人，仗十六萬亞美尼亞人逃亡，形成共和國間國家仇。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爾兩個共和國除了民族交情不睦外，領土糾紛也是主因，一九二一年七月，史達林裁定亞塞拜然共和國擁有納戈爾諾、卡拉巴赫主權，造成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八年兩次的大衝突，從此兩民族就糾紛不斷。這種領土事件在蘇聯共有三七五處糾紛之多，這種領土糾紛種族問題，相互糾葛暴發衝突，使整個蘇聯政體無法獲得適度的解決。

三、民族主義如火如荼·民主改革要求不斷

一九八八年二月初根據蘇聯真理報估計約有三萬個非官方的非正式團體，正致力於社會、政治、宗教、環保、民族主義推動，當然這包括最有勢力的新與草根運動的亞伯利亞、烏克蘭、沃爾庫塔、加拉干達的煤礦工人罷工運動，他們全力要求民主改革，並且不斷向共黨內強硬派人士施壓、恐嚇。他們雖然都宣稱支持戈巴契夫的重建政策，但是其實際行動外阻擾了許多政策的萌行。

蘇聯反對運動人士很迅速的抓住巴戈契夫開放自由政策的新契機，自一九八七年初開始，幾乎一夕之間成立了非正式的民主團體而風起雲湧。威脅著蘇聯當局。一九八七年四月，當時的莫斯科共產黨書記葉爾欽即批准一百四十八個不同的民主團體，這些團體並聯組成「民主聯盟黨」，公開宣稱是反對黨，和KGB和軍方集權人士激烈對抗。事實上，戈巴契夫歷經長期改革已覺精疲力竭，面對民族主義風行全國、環保問題、煤礦工人罷工運動四處爆發等內政崩潰，而無力干涉，直到一九九〇年在國內民主勢力的壓力下，戈巴契夫拋棄了共產黨，重新規劃新的立憲政體，實行總統制。事實上，民主改革派人士以總統制作方奪取共產權力的一種手段，當然全力配合，於是一九九〇年二月戈巴契夫迫使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憲法修正案，順利當上總統。（註十四）

捌、結 論

一、一九四七年九月蘇聯領導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義大利、法國等共產黨成立「共產黨情報局」(Cominform)，使共產陣營邁向國際化和結盟化，並正式和西方資本主義形成對抗的「冷戰」局面，於是捷克政變，柏林封鎖事件迫使西方倍感威脅，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由西方十二個國家簽署「北大西洋公約」，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在波蘭簽訂「華沙合作及互助公約」，於是冷戰時期的軍事對抗從此全面性展開，當然其間也發生「緊張的緩和」(razryadka napyazhennosti)和「低盪」(Detente)等階段性演變，但是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歐共產國家兩大集團的對抗，直到蘇聯政體的瓦解，兩大集團的強烈對抗局面才告終結，對整個國際政局而言，這是兩極化的軍備競賽的完全終止，而另一場多元化的經濟競賽才正式登場。

二、蘇聯政權基於內政因素「民生需求因素。長期困擾蘇聯當局」、「領土糾紛種族問題，相互糾葛暴發衝突」、「民族主義如火如荼。民主改革要求不斷」等問題無法解決終於瓦解，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各自獨立，然而這是一種內政問題演變的自然現象，其種族、經濟、領土等癥結問題依然存在，國際社會的區域整合趨勢，獨立國協如何去整合十五個共和國來面對未來的經濟競爭時代，則又是一個新形成的老問題，所以蘇聯政權瓦解後的整合，變成獨立國協，今後參與國際事務的基礎。當然獨立國協缺少中央集權式的專制統治，內部組織必定較為鬆散，對外主張與行動無法有統一的一致性，但是基於區域性的共同利益，具有「某種程度的結合」則是必然的，這種「某種程度的結合」將形成今後國際事務兩核化對抗死灰復燃的變數。

三、綜觀蘇聯政權七十年的外交政策，確實有階段性的數度轉變，然而在其轉變的過程中卻有固定的常數，那就是「國家利益」及「世界革命」兩個整體性目標，以「世界革命」不斷擴張的行動中，來整合內部十五個加盟國(SSR)二十個自治共和國(ASSR)、八個自治州(AR)、十個自治區(AA)、一百多種部族、一百多種語言、多樣化宗教信仰等複雜的內政問題，一切外交政策並完全配合內部經濟民生的「國家利益」。這種內部長期整合無功的情況下，獨立國協將由十五個共和國獨自分別進行整合，當然可預期會更見效果，但也非一蹴可及，共產主義強烈的意識形態，七十年來扮演著區域整合的催化劑，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要想完全拋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整合，依然會發生實際上的困難，因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仍然依附在各共和國，共產制度死灰復燃還是具有相當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為韓國慶熙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玖、註釋

- 註一：郭展義「蘇聯外交政策變遷的類型」，台北：菁英者出版社，1995，P.5.
- 註二：Adam B.Ulam, *Expansion & Coexistence: The Histor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67*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68), PP.142~149.
- 註三：韓國慶熙大學校論文集：，漢城：慶熙大學出版社，1986，PP.45~77.
- 註四：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6*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1968), P.43.
- 註五：韓國外國語大學蘇聯及東歐問題研究所「蘇聯政治過程」漢城：外國語大學出版社，1981，P.28.
- 註六：Ibid
- 註七：金學俊「蘇聯政治論：附錄蘇聯共產全黨大會記要」漢城：一志出版社，1982，p.443.
- 註八：上揭書，P.147.
- 註九：羅久蓉·莫昭平合譯「季辛吉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公司出版，1979，PP.152~154.
- 註十：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聯社專電。
- 註十一：Ibid
- 註十二：Ibid
- 註十三：「國際政治研究：郭展義博士論文摘介」（漢城：韓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出，1987），P.235.
- 註十四：郭展義「蘇聯外交政策總檢討」漢城：外國語大學蘇聯和東歐問題研究所出版，1990，PP25~27.